



中國史學史

◎ 白寿彝 主編

陈其泰 著

近代时期

(1840—1919年)

中国近代史学

第 六 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史學史



中国史学史

◎ 白寿彝 主编 陈其泰 著

第 六 卷

近代时期

(1840—1919年)

中国近代史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史.第6卷,近代时期: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学/白寿彝主编;陈其泰著.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070-3

I. 中... II. ①白...②陈... III. 史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4560号

责任编辑 张美娣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中国史学史

(第六卷)

白寿彝 主编

近代时期(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学

陈其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9.25 插页 4 字数 469,000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7-208-06070-3/K·1179

定价 50.00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目 录

第一章 时代剧变推动下近代史学的发轫与演进	1
第一节 民族危机的紧迫感与救亡图强史学的勃兴	2
第二节 维新变法酝酿发动与近代历史变易观和进化论的传播	8
第三节 封建帝制崩溃前后“新史学”的倡导和推进	14
第二章 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	26
第一节 对危机时代的敏锐反映	27
一、激烈批判专制制度的腐朽	27
二、大力针砭空疏学风 倡导学术经世	30
第二节 改造公羊学说 构建变革的历史哲学	33
一、“治世—衰世—乱世”	33
二、“少年《尊隐》有高文”	36
第三节 朴素的古代社会进化观	39
一、探求上古文明之起源	39
二、驳“严夷夏之大防”的迂见	42
第四节 擅长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43
第三章 魏源：近代史开端时期杰出的史学家	48
第一节 魏源的历史变革思想	49
一、警告衰世的到来	49
二、倡导经世学风	50
三、进化的变革的哲学观	56
第二节 《圣武记》对清代盛衰的探索	58

一、探索清朝统治的盛衰	59
二、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记述	62
三、总结军事指挥上的成败得失	64
四、《圣武记》在历史编撰和历史文学上的成就	65
五、比较和局限	67
第三节 《海国图志》：爱国主义的名著	70
一、呕心沥血总结历史经验	70
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起点	73
三、《海国图志》的编撰特点	77
四、《海国图志》的深远影响	83
第四节 《道光洋艘征抚记》对当前“活的历史”的记载	85
一、著述的勇气	85
二、具有鲜明爱国思想的信史	87
三、与歪曲历史的记载相对比	91
第五节 《元史新编》的史学价值	93
第四章 徐继畲、梁廷柎、夏燮的史学	99
第一节 徐继畲《瀛寰志略》的特色	99
一、著述背景与机遇	99
二、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起点	100
三、与《海国图志》的比较	104
第二节 梁廷柎：《夷氛闻记》和《海国四说》的史学价值	106
一、《夷氛闻记》的爱国御侮思想	107
二、《夷氛闻记》的史料价值	110
三、《海国四说》对外国知识的介绍	114
第三节 夏燮的史学成就	119
一、“沥血叩心，忧危入告”的著述精神	119
二、歌颂爱国军民 揭露投降派罪行	121
三、编撰《明通鉴》 总结历史教训	125

第五章 边疆历史地理学的兴起	128
第一节 张穆著《蒙古游牧记》	128
一、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	128
二、显著的特色 宝贵的价值	130
第二节 何秋涛著《朔方备乘》	137
一、“备用”的宗旨和编撰的特点	138
二、记载中俄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139
三、详载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始末	144
四、记述全面 议论精辟	147
第三节 蒙元史研究的新风气	151
一、晚清蒙元史研究的兴盛	151
二、传统汉学精神与晚清蒙元史考证	154
三、中西文化交流与蒙元史研究的新路	159
四、蒙元史研究的集大成	161
第六章 19世纪70至80年代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成就	164
第一节 早期维新派的历史变革思想	164
一、萌芽中的近代进化史观	164
二、初步的世界观念	166
三、“变局观”与社会改革思想	168
第二节 王韬与《法国志略》	174
一、《法国志略》的编撰与重订	174
二、对西方国家富强之道的认识	176
第三节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史学价值	178
一、对明治维新“改从西法,革故取新”的及时总结	179
二、打开观察世界潮流的窗口	185
三、具有强烈的史论色彩	188
第七章 戊戌维新时期历史观的新进展	194
第一节 康有为公羊“三世说”历史观与维新变法的发动	194
一、公羊学说何以被改造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	196

二、“三世说”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糅合	203
三、变革的历史观与维新变法的发动	206
第二节 严复与近代进化论的迅速传播	208
一、天演学说风靡海内	208
二、爱国志士共同的思想历程	215
第八章 梁启超：“新史学”思潮的出色代表	219
第一节 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220
一、“新思想界之陈涉”	220
二、批判封建专制 力倡“新民”之说	226
第二节 梁启超《新史学》的划时代意义	232
一、倡导“史界革命”	232
二、论“正统”和“书法”	238
第三节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非凡气魄	240
一、高度的洞察力	240
二、中肯的分析	243
三、鲜明的批判精神	246
第四节 当代史述·人物传记·亡国史鉴	248
一、《戊戌政变记》	248
二、《袁崇焕传》和《王荆公》	253
三、亡国史鉴	259
第五节 两部先秦史名作	260
第九章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成就	274
第一节 历史观指导上的探索和突破	274
第二节 对中国历史演进别开生面的论述	279
第三节 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描绘	284
第四节 创造了新颖的编撰形式	287
第十章 20世纪初宣传革命的历史思想	289
第一节 邹容与《革命军》	289
第二节 陈天华与《猛回头》、《警世钟》	293

第三节 章炳麟的政论与史论	296
一、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	296
二、继承朴学成就与运用西方新学理	299
三、提倡“国粹”与鼓吹民族主义	304
第四节 国粹派的史学活动和史学成就	307
一、国粹派史学的形成	307
二、国粹派的史学观点与治史方法	311
三、国粹派史学的成就与局限	320
第十一章 近代时期其他史学著述	325
第一节 《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附:《宋学渊源记》、 《汉学商兑》)	325
一、对乾嘉汉学兴盛的及时总结	327
二、着力摹写汉学家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333
三、倾注著者感情 凸显学术个性	340
四、引起的评论和辩难	345
第二节 《湘军志》和《清朝续文献通考》	348
一、《湘军志》	348
二、《清朝续文献通考》	354
第三节 南明史和辽、金史著作	361
一、《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传》	361
二、《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	366
第十二章 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内在动力、时代条件和学术 机遇	369
第一节 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内在动力	369
一、批判专制 憧憬民主	371
二、朴素的历史进化观	373
三、历史编撰中生命力的显示	376
四、考史方法中科学因素的发扬	377
第二节 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379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西文化接触与史学风气的变化	379
二、从冯桂芬《采西学议》到黄遵宪《日本国志》及时记述日本 “改从西法”	383
三、戊戌前后以输入西学为急务与对“君史”的批评	386
四、严复对西方近代思想系统传播的巨大功绩	390
五、以新鲜的历史观为指导与“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	394
第三节 新史料发现提供的学术机遇	396
第十三章 中国史学近代化新格局的创辟	402
第一节 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新范式	402
一、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成功运用	402
二、陈垣：宗教史的开山之作	418
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	425
第二节 历史观的新变革	442
一、陈独秀：“思想界的明星”	443
二、李大钊：由具有卓识的社会历史观点走向唯物史观	448
后 记	456

第一章 时代剧变推动下近代史学的发轫与演进

中国史学经历两千余年的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的史学,基本上是在中国自身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形成和演变的,我们称之为“传统史学”。近代史学发轫于鸦片战争时期,其在历史观和著述内容等方面都已开始明显不同于前代。史学领域的深刻变化,是由于社会条件发生的剧变刺激和推动的,同时也是学术文化内部新旧推移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前,近代前期史学走过八十年的路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到1860年前后,是经世致用、救亡图强史学思潮勃兴和中西文化撞击下史学开始突破传统学术格局的时期。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到90年代末,由于维新变法思潮酝酿、发动的刺激,以及西方近代思想进一步传播的影响,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开阔眼界,中国人学习西方已经注重学习其制度,进而注重学习其思想学说;史学领域出现的最大变化,便是阐发世界必变、历史必变的观点并日益扩大影响,以及西方近代进化论的迅速传播。进入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当封建帝制最后崩溃、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成立,曾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但很快革命归于夭折,国内政治处于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之下。此二十年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激烈对抗,史学领域内的主要特点,则是“新史学”思潮的涌起和宣传革命的历史思想的活跃;最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跨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门槛,在治史方法和历史观点上都产生了别开生面的著述,由此而昭示中国近代史学将向新的境界发展。

第一节 民族危机的紧迫感与救亡图强史学的勃兴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进程出现了巨大变局。恰好中国近代史学的发轫同样在鸦片战争时期开始。

中国封建社会行进到明清时期,已经进入到衰老阶段。虽然它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在某一时间内在经济、文化上尚有发展,但在总体上,在根本制度上,它已经失去旺盛的活力,行将衰落。明清时期,西方国家由于地理大发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中国衰老的封建社会却步履蹒跚,中外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转入了被动的劣势的地位。16到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商船先后到达中国广东、福建海面,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荷兰人侵夺台湾。16世纪末,英国海船开始驶向东方寻找原料和财富,并于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贸易,进行殖民事业。相比之下,中国明朝永乐年间虽然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每次出使西洋(中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及近海各地),随员及舵工、水手大多在两万人以上,规模如此之盛,但在郑和以后,却再也没有远洋航海者继其事业。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人的航海壮举却引起欧洲一大批航海者踵继其事业,由此而构成整个的地理大发现,推动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东西方如此巨大的差别,原因即在于郑和出使西洋的目的是宣扬国威,而哥伦布等人航海的背后,却是经济活动的驱使,渴望在东方获得财富,以满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历史阶段的利益需求。在明代,对中外交往的限制尚不严格,故嘉靖以后,东南沿海私商与欧洲商人之间的贸易达到一定的规模,明末欧洲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与中国士大夫互有交往。及清初厉行海禁,规定片帆寸板不得下海。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收复台湾之后,才解除海禁,规定粤、闽、浙、江四海关与外国商人定期贸易。雍正时期,明令禁止外国人传教。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朝诏令规定只保留广州一处口岸贸易。乾隆对外一向持维护天朝尊严的虚骄心,曾赋诗云“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吐露出对外睥睨防范的心态。清朝政府如此实行闭关锁国政

策,必然造成朝野对于外界事物暗然无知,欧洲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并全力向东方扩张殖民地,中国人却有如鼾然昏睡毫无知觉。刊行于乾隆四年(1739年)的官修《明史》,在《四裔传》中能够明白列举的欧洲国家只有四个,即佛郎机(指葡萄牙,但有时又兼指西班牙)、吕宋(指西班牙,其时占领菲律宾)、和兰(荷兰)、意大利。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次年7月到达中国,清朝仍以蛮夷之邦视之,在安排乾隆接见时,与马戛尔尼发生礼仪之争,马戛尔尼不愿对清朝皇帝行跪拜大礼,乾隆对此大为诧异和恼怒,称“此等无知外夷,不值加以优礼”。然而马戛尔尼此行却探得清朝虚实,回国后向英国政府报告说:中国像一只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一旦由一个没有才干的人指挥就没有安全和纪律可言,而英国将从这一变化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其后,英国即策划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嘉道时期的清朝,正处于这种岌岌可危的境地。

在国内,乾隆末年以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所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已暴露无遗,社会危机迅速加深。当时极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统治阶级贪婪地向民众剥削榨取,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大官僚、大地主占田多达几千顷至几万顷,吏治极其败坏,贪污贿赂公行,以乾隆皇帝为首的贵族、百官以及大地主、大商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由于官僚、地主攫取土地遍及各省,大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便要受高额地租剥削。加上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水旱灾害一起袭来,逼迫得农民实在无法生存下去,只好外出逃亡,造成嘉道年间极为严重的流民问题。当时,有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徙在高山密林、深壑荒岛之间,挣扎在死亡线上。其中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大山林聚集最多,别的地方也有数量不同的流民聚集。据《续文献通考》和《清实录》等书记载,广东、福建的流民流向台湾,关内的流向关外,还有贵州的苗山,浙江宁波、台州交界的南田地区,以及淮河边,都有流民聚集。数以千万计的流民转徙各地,突出地表明社会之不安定,危机之深重。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就是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这次起义蔓延鄂、豫、陕、川、甘五省,持续时间达九年之久。斗争过程中曾丧失起义的领袖,但起义却长期坚持下来,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痛苦不堪,他们欢迎起义军的到来。嘉庆在诏中也承认“良民不得已而从贼者日以渐多”。清朝统治力量不断削弱,连禁卫森严的皇宫也受到了攻击。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起义群众七十多人进攻皇宫,后来虽然失败,却使统治集团陷于一片混乱。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清朝耗费了巨额军

费、资财。到鸦片战争前夜,清朝统治已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

史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特定的社会状况、社会环境总要反映到那一时代的史学风气上来,社会生活状况发生深刻变化了,史学风气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在此之前的清代史学,经历过清初和乾嘉时期两个阶段。清初史学诸大家,治学气象博大,同时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乾嘉史学以考证学发达为特征,在考证史实、制度、年代、文字歧误、版本异同以至辨伪、辑佚、目录、避讳等项,都有许多成果,在整理历史文献上取得很大成绩,有的学者如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治学更有总结性的特点。乾嘉考证学风的极盛,既是清廷实行极度的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的,但同时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说,古代繁富的典籍在长久流传的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歧误和难解的问题,也确实存在着进行一番整理考订工作需要。从整体上说,乾嘉诸儒治学比起清初学者来,经世致用的意识是大为褪色了,但是,在戴震、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崔述和章学诚这些出色人物身上,却又分别在考证方法的精良、探求历代盛衰治乱之迹和理性批判精神等方面,显示出近代色彩,在当时又具有超前的意义。尤其是,赵翼将“考史”与“论史”融为一体,揭示出其《廿二史札记》的著述宗旨是探求“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并隐然以顾炎武之《日知录》自比^①;章学诚倡言学术经世,晚年对自己一生著述以求“经世”和“救弊”的宗旨作了深刻的总结:“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②俞正燮著《癸巳类稿》被视为考据精审之作,而其《驻扎大臣原始》、《俄罗斯事辑》、《总河近事考》等,考证范围已包括设置新疆、西藏驻扎大臣的由来,中俄关系,清代治河史实等项关注现实的问题;这些都明显地预示着乾隆末年以后学术风气行将转变的趋势。

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时代剧变的推动下产生了经世致用、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有不少晚清人士每称鸦片战争时期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变局”,无疑是准确地道出了他们的切身感受。今天我们审视历史,更能充分地指明这一时代转变的空前剧烈和深刻。在社会结构上,它标志着中国由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在中外关系的格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王树民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②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九《上尹楚珍阁学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页。

局上,西方殖民者东来,用大炮把古老中国紧锁的大门打开了,中华民族不断遭受野蛮的侵略、凌辱,历史悠久的、行进缓慢的、步履维艰的东方文化面临着西方进步文化的严重挑战,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冲突。社会危机和民族生存危机的双重刺激,迫使有识之士把学术与批判封建专制、改革社会积弊联系起来,进而与反抗侵略、学习西方长处联系起来,史学走出了“醉心考据”的“象牙之塔”,由前一时期的“考史”转变为“著史”。鸦片战争的爆发,推动了历史学家打破传统史学的格局,破天荒地把视线投向世界,人们开始抛弃闭塞听、夜郎自大的旧意识,探求西方知识。鸦片战争时期及其后,一些历史著作与社会现实问题这样紧密联系,同民族的命运这样息息相关,在以往是很少见的。

“鸦片战争时期的史学”所包括的时间,自应比鸦片战争爆发至《南京条约》签订时间为长,这是因为学术思潮的变迁无不前有酝酿后有延续。当魏源于1825年编《皇朝经世文编》时,已经关注了东南海防问题,他和龚自珍所写的大量史论、政论,尤其表示出对社会危机的严重关切,实已开了近代史学转折的先声。魏源、姚莹、徐继畲、夏燮等人在战争期间酝酿撰写的著作均完成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如《海国图志》百卷本完成于1852年。以记述鸦片战争经过为主干部分的《中西纪事》,对初稿进行增订则在1859年。故此考察鸦片战争时期的史学思潮,向上应追溯到嘉庆道光之际龚、魏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考证末流烦琐学风的批判,倡导学术“经世”,向下应延伸到夏燮经过增订著成《中西纪事》的1860年前后。

龚自珍虽然卒于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年,但他的思想属于近代体系。他生活在封建社会行将崩溃的转折时期,他的思想便是这个转折时代的一面镜子。在当时,历史前进的要求,就是要结束封建专制的统治,使中华民族在危机之中得到解放,经由深刻的变革,走向世界先进国家的民主政治的道路。龚自珍及其挚友魏源敏锐地感到时代风暴即将来临,在举世如痴如梦、歌舞升平中,惟独他们为国家民族命运忧心如焚,日夜不安,上指天下划地,规设经世大计。龚自珍宣告封建统治已经到了“衰世”,“乱亦竟不远矣!”^①大胆地预言时代大变动就要到来。这种对时代危机痛切的感受,逼使他去寻找社会的病因,解救的良策,展开了对扼杀民族生机的专制主义和束缚人们头脑的腐朽文化的猛

^①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

烈批判。他无情地诅咒封建末世的黑暗混沌,同时渴求和憧憬一个变革进取、人才涌现、个性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自觉的战斗的意识,使他对长期窒息人们头脑的旧观念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他所写的犀利的政论,同时也是具有强烈时代气息、影响深远的史论。龚自珍认为史学的作用是“忧天下”,“探世变”^①。又说:“史之材,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以教训其王公大人。”^②史学要探究历史的发展变化,要用历史事实来教训那些统治者,并作为今天革除弊政、挽救危机的根据。他一生瞩目的重点,始终是“东西南北”之学。他对西北边疆史地有精湛的研究,最早提出新疆设置行省的提议,显示出他着眼于解决社会危机、巩固国家统一、安定边疆的卓识。

魏源的学术观点与龚自珍甚相契合。他对当时流行的烦琐考据,尖锐地指出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③。他认为有用的史书应该是医治弊病的药物,“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④。他编有《皇朝经世文编》,以反映清代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重要问题,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重要资料。在鸦片战争前后,他发愤著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这三部书都是有关当代历史和眼前事实的近代史学重要著作,魏源也因此成为近代史开端时期史坛风气转变的出色代表人物。尤其是《海国图志》一书恰恰符合于这一时期抗击外国侵略、“开眼看世界”的迫切要求,第一次系统地、大量地介绍外国史地知识,突破了传统学术“严夷夏之防”,对外国闭塞无知的旧格局。为了向国人介绍急切需要的外国知识,他把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材料全部汇辑进去,“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⑤。对于外国人的撰述,即所谓“西洋人谭西洋”者尤为重视,修撰成一部当时东方世界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参考书。魏源尖锐地揭露统治集团对外国昏暗无知,是造成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心事乎?”^⑥相比之下,英国却“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洞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⑦因而他大声疾呼:“欲制外夷者,必

①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7页。

②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龚自珍全集》,第28页。

③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9页。

④ 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序》,《魏源集》,第163页。

⑤ 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第207页。

⑥ 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6页。

⑦ 魏源:《暹罗东南属国今为英吉利新加坡沿革》,《海国图志》,第449页。